

民间乐社成为乡村文化使者

陈辉

以艺术的手段配合乡村建设,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从而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共同富裕——“艺术乡建”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当下,乡村礼俗仪式空间应用场景不断减少,民间礼俗音乐从“仪式化传承”过渡到“去仪式化发展”阶段;原本依附于婚丧嫁娶、庙会祭祀等礼俗仪式场域的传统乐种,逐渐走上了“由俗入雅”的艺术化发展之路。江南丝竹、苏南吹打、浙东锣鼓等民间传统乐种,已不再依附于礼俗仪式场域,而以舞台表演的形式独立存在,这对于民间乐社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在蝶变中求生存

在充满活力的江南地区,文化决策部门和民间文艺团体已率先思索“艺术何为,乡村何需,农民何求”这一时代命题,发挥民间乐社在“艺术乡建”中的文化赋能作用,使之在节庆、旅游、休闲、娱乐活动中大显身手,满足文化消费者“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精神需求,让民间乐社成为乡村文化的“代言人”。浙江省自2016年推出的“国乐乡村”建设活动,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民间文艺团体的积极响应,乡村民间乐社纷纷重新组织起来,丰富了民间文艺活动,带动了乡村旅游产业。

民乐、民歌是乡村文化的无形资产,也是乡村旅游的活广告,具有丰富乡土文化内涵的民间音乐,一旦成为乡村独特的声音景观和文化标识,必将为乡村旅游注入新的活力,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江南古镇有不少闲

置的古戏台,这是民间乐社得天独厚的展演平台。如江南古镇周庄,游客在欣赏水乡风情的同时,还可以在古戏台聆听优美典雅的江南丝竹,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品质与审美内涵。旅游景区还可以着力打造乡村民俗文化的声音景观,让游客在休闲度假时欣赏民间音乐,感受乡土风情。国家4A级景区长屿硐天位于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长屿村,是自南北朝以来人工采石遗留下来的景观,由28个硐群、1314个形态各异的硐窟组成,其中以岩洞音乐厅和石文化博物馆最具特色。岩洞音乐厅有一个长期驻演的民间乐队,每天为游客表演轻松愉悦的民乐节目,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随着岩洞音乐厅影响力的扩大,国内外专业乐队也来这里演出,提高了旅游景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

在生存中谋发展

民间乐社建设应利用地方资源,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挖掘当地民间音乐资源,在原有班社的基础上进行重建,使其焕发新生。

“二月二灯会”是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一带的传统节日。灯会期间,宁溪古镇家家户户挂彩灯,各宅集资组织迎灯、演戏、舞龙、舞狮、迎神等活

动。《作铜锣》是“二月二灯会”的必奏曲目,用于迎灯队伍的开道与行进步伐的节奏控制。乐曲古朴庄重,细吹慢打,重复却不单调。《作铜锣》源自南宋,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曾一度沉寂无声。20世纪5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师生在黄岩宁溪采风,对其进行了挖掘整理,将它恢复原貌。“二月二灯会”活动结束后,铜锣会乐队还沿街边行进边演奏《作铜锣》,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缓缓地流过街头。人们在观赏山村夜景的同时,还能感受

到古曲的音韵流转。

近年,台州民乐团对宁溪“二月二灯会”和民间音乐《作铜锣》进行了深度挖掘和艺术创新。2024年,该团委约作曲家周成龙创作的大型民族交响组曲《宋韵台州》亮相“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音乐会以器乐演奏和情景表演的形式,展示了台州民俗等传统文化。该团在发展壮大、扩大影响的同时,不忘反哺乡村,每年为民俗节庆、乡村旅游、非遗展示、文艺下乡等活动演出50余场,丰富了当地群众的音乐文化生活。

在发展中寻提升

生态民歌进行加工改编,使之更贴近现代观众的审美,以丰富多彩的演唱形式和情景表演,将仙居山民的劳动场景、爱情故事、民俗风情呈现于舞台,成为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的一张文化名片。

在“艺术乡建”背景下,一群有着共同爱好、共同志趣、共同追求的人,组成民间音乐团体,活跃在乡村的舞台,成为乡村文化的使者。作为“艺术乡建”的有机组成部分,重建的民间乐社,用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提升乡村文化品质,重塑乡村人文环境,日渐成为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乡村文化有效的“助推器”和“催化劑”。



近日,国家级非遗项目梁平木版年画暑期体验课在重庆市梁平区屏锦镇的徐家辉大师工作室开讲。中央美术学院、重庆旅游职业学院的学生和梁平木版年画的爱好者在体验课上亲身参与雕版、印刷等工序,感受传统非遗的魅力。

唐奕 摄

以中国独特的生活哲思通达新时代美好生活

王春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时代美好生活不仅是物质丰盈、共同富裕的生活,更是精神超拔、境界高尚的生活。中国独特的生活美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既凝结着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又回应着新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哲学审视;既关乎百姓日用的审美创造,又指向人生境界的持续提升,更具有包容开放的世界格局。就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思想特质、生活美学的现实价值与实践指向、面向未来的生活美学与生活美育等问题进行了阐发,从不同角度对“以中国独特的生活哲思通达新时代美好生活”这一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现出了新时代青年学者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

生活美学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中国

的生活美学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大众审美文化风潮而兴起的,在21世纪初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讨论中达到了生活美学理论研究的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概念和中国的传统交融碰撞,各种学术观点和实践视角层出不穷。马克思非常重视和强调“生活”,他曾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新时代,中国的生活美学研究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自主的生活美学知识和实践体系。几位青年学者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路径下开展的,如王一楠认为“中国的生活美学理论资源,植根于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宇宙观与充盈其间生命意识”,“这些思想渊源不仅渗透到艺术的历史中,而且广泛浸润于百姓的生活中,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袁劲也认为“古代典籍,尤其是富有生活气息的笔记、诗话、评点、语录、清言里,还蕴藏着大量有待解读的生活美学资源”。康倩则进一步总结出“儒家的伦理美学、道家的自然美学、禅宗的觉悟美学、《周易》的‘生生’美学这四大核心脉络,它们共同铸就了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哲学基因——‘道器不二,即用显体’,塑造了‘日用即道’的中国审美生活范式”。

中国的生活美学从来不是脱离实

际的玄思,而是贯穿于衣食住行的生活哲思与人生智慧。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将审美活动视为人格修养的重要途径;庄子感叹“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主张在自然万象中体悟生命本真。这种“即凡而圣”的美学观,让中国人在柴米油盐中发现诗意,在日常交往中涵养德性。中国生活美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将其“生活”与“境界”贯通。北宋大儒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的体悟,展现了审美活动对精神世界的拓展。这种美学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思辨,是渗透在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生活态度,正如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既尊重个体的审美体验,又体现人与万物共生共荣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美不美”。这种转变背后,是对精神归属、文化认同感和审美获得感的深层渴望。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有品质的实用”与“有温度的审美”。中国当代生活美学就是要在传统与现代的传承和发展中找到结合点,既需要坚守文化根脉,又需要回应时代需求。三位青年学者都对生活美学通达美好生活的现实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传统生活美学所蕴含的智慧,在哲学层面为个体

生命意义的确证与社会和谐秩序的构建,提供了极具现实价值的启示”(康倩)。“生活美学的现实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对感性意义合法性的确认,重塑现代人的存在方式,释放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力”(王一楠)。“当代生活美学指向人在体验时空事物,尤其是衣食住行时,以‘审美且适性’的方式葆有其生机与鲜活”(袁劲)。

中国生活美学的当代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感官刺激和欲望泛滥充斥市场,将生活美学简化为商业噱头;快节奏和浅表化生活,使人们难以沉下心来感受和体悟生活之美;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中,部分人盲目追捧西方生活方式。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美好生活的构建,既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审美能力;既需要开放包容,更需要文化自觉。蔡元培曾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生活美育”是实现新时代美好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在教育层面加强“生活美学素养”的培育,引导人们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守护精神家园,在技术迅猛的时代保持人文关怀,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不忘生活本真,真正通达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至高境界。在这条虽然艰辛但也充满诗意的路上,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大批青年学者正以扎实的学识和自信的品格,肩负起新时代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

共赴文化“充电”之旅

李仲良 李传山

近年来,智能手机上的微游戏、短视频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选择,短视频已成为不少人手机上的必备应用。一些网友表示“本来只打算刷一会儿短视频,不知不觉间两三个小时过去了”“一副就停不下来了”,相互倾诉被短视频占据大量精力的无奈。对短视频的过分依赖,的确使一些人陷入“碎片化”的认知怪圈,削弱了完整阅读、深入思考的耐心和能力,这是导致深度学习能力逐渐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庆幸的是,伴随网上一场“深度学习行动”的兴起,一大批青年人通过阅读书籍、设计文创、进剧院、参观博物馆等活动,积极恢复深度学习状态和能力。数据显示,2025年“五一”期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60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17%;全国实体书店客流量回升至2020年水平,某平台“长文阅读挑战”累计打卡也超千万次。各类文化机构开展临摹书法名帖、名著阅读、刺绣茶道等活动,为年轻人提升深度学习力提供了广泛选择。不难发现,青年群体正在努力尝试突破“碎片化”的桎梏,在数字洪流中重新锚定自我目标,并带着执行力投入其中。

这场行动的关键因素是青年群体的自我革新,它是青年个体追求精神健康的意愿表达,更是当代青年推进文明存续的责任自觉。

恢复深度学习状态是重建自我的选择,“深度学习不在状态”已给青年群体带来一些问题,他们亟须进行自我修复。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试图通过观看短视频解压,却被“碎片化”和“算法投喂”的内容占据大量时间,严重影响个体的精力。有的人不惜以减少睡眠时间、危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熬夜刷手机。同时,经过二次创作的短视频,消解了读者对经典文本的纵深理解,容易造成个体的阅读和思考障碍。另外,AI等工具的“即得性”使一些人不再静心阅读基础文献,也难以建立认识和分析具体问题的系统架构。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深度学习状态不佳与阅读能力下降、专业素养不足、认知浅表化、情感缺失等现象呈互动关系,彼此相互影响。因此,通过“深阅读”“专注力训练”等方式恢复深度学习状态,修复被削弱的高阶思维能力,被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提上日程。

恢复深度学习能力关乎社会文化健康发展。深度学习能力是人们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因素,促进或制约着个体参与文化活动的深度广,因而也成为衡量社会精神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恢复深度学习能力,需要增强人们积极参与、体验文化活动的本体价值的能力。一方面,我们应当不断优化社会文化生态,通过“慢文化”实践,体验沉浸式文化活动,矫正异化的文化消费观,以此对抗功利性“知识快充”现象,改善社会文化的节奏和秩序。另一方

面,我们应当鼓励青年群体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帮助他们缓解压力 and 疲劳,提升心理韧性和心理健康水平。并且,全社会应当共同努力打造更多可以共同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促进跨职业、年龄的社会交往和认同,减少数字化时代的代际隔阂并增强社会联结。

青年群体的深度学习意识与文化传播息息相关。文化传播需要依靠文化基因的代际传递,这种传承绝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社会个体对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深度学习意识不足会损伤个体参与文化活动的精力和耐心,进而从整体上影响文化传播的程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深度参与文化活动是保持人类思维独特性的有效手段。然而,AI时代知识“搜即得”和算法推荐构筑的“信息茧房”,制造的文化摄入的虚假饱足感,让大脑容易陷入“高刺激—低营养”的循环,严重影响个体获取文化知识的整体性和思辨性。科技软件的跳跃性逻辑和情感表达能力,始终无法代替人类思维和人性价值,因此文化传承更多地需要依靠人类自己。增强深度学习意识即意味宣示个体的精神主权,修复被碎片切割的整体文化感知能力,这能够夯实文化传承的生态基础。

当下,我们应当发掘个人潜力,依托社会支持,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深度学习能力,为参与文化活动储备足够的精神能量。恢复深度学习能力的关键在于个体的人,我们不妨调整工作、生活与学习的关系,适度制定“文化作息表”,从每天1刻钟“阅读+书法(写作)”微量训练开始,逐步增加时长和难度,不断提高文化摄入量并重建专注力。我们不妨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汲取提升深度学习能力的养分,参观博物馆、参加音乐会、走进影视剧、体验工艺制作等,唤醒被数字生活钝化的感知力。当然,我们还可以主动营造提升专注力的文化氛围,开展与家人、同事、朋友“共读一本书、共赏一幅画、共评影视剧”等文化活动,将独自修行转为“组团开卷”。

我们同样要认识到,青年群体恢复深度学习能力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期待各社会团体、企业、文化机构同发力,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鼓励员工深度参与文化活动;提供读书会、市民夜校、博物馆延时开放、24小时书店等多元社会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创新非遗工坊、文化研学等形式,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项目等,为恢复深度学习能力提供系统支持和精细服务。相信在多方努力下,特别是在青年人的主动作为下,青年群体恢复深度学习能力、增强文化鉴赏能力、储备文化活动精力的尝试,能扎实落地并不断取得成果,获得经验,为青年个体的成长发展巩固基础,为社会形成更好的文化氛围涵养生态,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承提供更好的环境。

英烈事迹入展馆 精神永承传

王腾腾 刘进伟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取得的发展成就。其中介绍,“十四五”期间,迎回4批265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并进行隆重安葬,推动7000多名英烈事迹进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进行展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如此系统化、规模化地展陈烈士事迹,其意义非同一般,这是一项内涵宏大、意义深远的红色基因精神铸造工程,彰显出党和国家对烈士的铭记与崇敬,进而让革命英烈的精神力量历久弥新。

多年来,党和国家始终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和奉献,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弘扬英烈精神。但是,也要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英烈事迹的保存、纪念形式呈现出相对分散与局部化的特点,影响了公众对英烈精神的深入理解,以及对英烈烈士的集体建构。

由此看,系统整合英烈事迹资料,显得十分必要。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接受教育和洗礼的一座精神家园,是引导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基地,是党史研究和宣传的权威阵地。7000多名英烈事迹入馆,标志着英烈记忆从分散走向凝聚,成为党和国家发展历史的核心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展馆展陈的7000多名英烈事迹,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的具体呈现,让英烈精神实现了由抽象到具象的转变。英雄烈士的故

事多以口口相传或者文字故事的方式存在于民族记忆中。为了让英烈事迹具象可感,展览馆高度重视革命文物以及相关实物的征集,包括李大钊同志就义的绞刑架,赵一曼同志在牺牲前给儿子的遗书,陈红军、陈祥榕等人执行任务时使用的器物等珍贵的文物,从而让抽象的英烈名字和事迹转化为可感、可知、可敬的鲜活形象,让公众置身其中能有更为深刻的认知与思考。

具象化展示英烈事迹,能够将英烈精神由情感共鸣转化为人民心中的精神传承。一个个鲜活的英烈事迹展陈,让历史记载拥有了直抵人心的情感温度与精神重量。当观众置身于这个由无数鲜活生命故事编织的精神场域,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便自然发生,深刻的价值塑造与精神洗礼也悄然完成。

英烈事迹的展出不仅是为了保存历史,也是以英烈记忆照亮民族复兴的前路。英雄烈士为国捐躯的事迹,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一百多年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千上万的英烈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人民群众不懈奋斗,凝聚起源源不竭的精神伟力。7000多名英烈事迹的集中展陈,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更是照亮民族复兴未来的灯塔。

英雄烈士撑起了民族的脊梁,党和国家对英雄烈士的崇高礼遇,体现了“人民至上”“崇尚英雄”的坚定立场。新时代新征程,铭记英雄,才能让英雄辈出;传承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才能让英雄之志永垂不朽,才能激发出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